

社工與政治——當民意代表介入社會工作專業時之回應策略

姚智仁

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時代的變遷及網路資訊發達，各地民意代表為拚高曝光率及好感度，無論是開實體或網路記者會、施政直播，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就為在選民心中留下好印象。然而因「弱勢關懷」議題總能引起社會大眾關注，越來越多民意代表打著正義的旗號，強行介入社工人員專業服務的狀況層出不窮。

民代介入社福的狀況在全臺各地時有所聞，如地方民代前往兒保個案家中拍照，曝光受虐兒少的居住環境及鄰里資料、民代以社群媒體直播方式，揭露主責社工個資、民代在議會殿堂上直接爆料校園性侵案件、更有民代介入兒保案件主導與警員協助在派出所演戲嚇兒童等，這些民代似乎爭先恐後急著將個案資訊或處理過程公諸於世。社工人員處理或回應如無法符合民代期待，可能馬上被修理或受

到不堪入耳的言辭羞辱。北部就曾發生某民代施壓逼迫公部門社工離職，引發社福界走上街頭抗議，中部也曾有民代因指責公部門社工「坐領高薪」、「只吃飯拉屎」，引發社工界集體憤怒（陳逸淳，2016）。

臺灣是一個高度自由的民主國家，民眾可透過選舉，從基層民代的里長、議員，高至立法委員，都能自由投票選出想要的民意代表。正因為如此，民眾也習慣請託民意代表，直接向公部門施壓以主張或爭取自己的權益，這樣的現象特別普遍存在於各縣市政府，這種民眾請託地方民代的文化也成為地方民代重要的選民服務方式之一（Yu & Liao, 2020）。

民意代表為選民服務是理所當然，但是在分際上應該要有所界限，他們相較於一般民眾有更多的管道與機會能了解社工的工作倫理與相關限制等，若民代想要博取版面大可透過關係，在尊重社工

專業與解決兒保問題間取得適當資訊，再透過幕僚集思廣益，想出一個既專業又能解決問題的做法來強調自身在社福領域的關注與專業。然而許多民代卻選擇以傷害或壓迫社工人員的方式來獲得曝光，將社工推向前接受大眾的指責與批評（非彌，2019）。試想當事件發生後，社工及其單位都還沒來的及自我檢討前，就被迫被民代及社會大眾嚴加批評，對於事件本身不但沒有幫助，反而可能變成壓垮社工最後一根稻草，讓社工走上離職一途。

舉例來說，某個三歲兒童在幼兒園遭受老師體罰，家長求助民代後，民代高度介入並痛罵公部門冷血，未能協助幼童免於受暴，主責社工被要求鉅細靡遺交待服務細節，而對各種調查及社會公評，最終因受不了壓力而離開社工崗位。民代介入是類案件，可以形塑出民代「有在做事」、「關懷弱勢」的正義形象，相對被汙名化的社工人員因「混水摸魚、不積極任事」，才會被民代責罵；此種只問福利不問專業的民代，成為民代面對人民陳情的最高原則（陳逸淳，2016）。這也是民代喜歡介入「社會公益性事件」，此時若再透過媒體推波助瀾或自媒體直播及社群媒體分享，可讓民代「名利雙收」，甚至助攻下一次選舉，讓民代可取得連任機會，而持續有權利介入「社福案件」，長久打著監督與替人民發聲的旗號，干預社工專業處遇。

民代督促行政部門是其職責，然高度介入及不明究理的干涉，反而造成反效果，這樣的反效果會施壓及影響到執政者的合法性權力，如果機關行政首長扛不住壓力，亦會影響公部門的社工處遇的公平及一致性。民代拿著「選民服務」的大旗為藉口，公然介入個案的處遇及資格審核，這些都讓主責社工倍感壓力，社工照著SOP流程「依法行政」，卻因民代的介入而需更改處理方式，這種結果也會使得社工陷入違法的高度可能性，也是最讓基層社工感到無力的主因（姚智仁，2021）。

作者因為工作關係，時常需不分黨派與各級民代互動，大多數的民代都能秉持公平正義及理性對話的原則；僅少數幾位民代較為固著與情緒化。雖然公部門在處理民代請託案件時，會擬定處理流程及處理層次；多數民代的助理、秘書或辦公室主任，也都可配合行政部門的處理流程，然而民代的請託案件時常伴隨著某些期待，當民代介入後，一線社工容易因民代的介入而產生「反感」，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討厭人民透過關要干預處遇結果；有時也包括不知道要如何回應民代？又或者要試探長官對民代有什麼回應與承諾？社工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符合社工倫理而又能達到民代關說的期待等等。爰此，本文主要目的是為因應臺灣民代特有的選民服務文化，累積個人在工作上與民代互

動的實務經驗及爬梳相關文獻，整理相關的因應策略，期能提供實務工作者應對民代介入社工專業時之參考。

貳、民代介入關說社福型態

民眾面對權益的爭取，可能習慣透過民意代表，以施壓、關說、連結、影響決策和涉入政府工作來達到目的（Pawar, 2014）。社會工作在社會和政治脈絡的發展有跡可循，社會工作領域容易與「人的處遇」有高度相關，舉凡各種經濟扶助、福利服務、長照服務、保護扶助及司法協助等狀況多元，每個人的情形都具有其特殊性，社工所服務對象，不僅是弱勢且大多是極需要協助的族群，若以保護性案件而言更涉及人身安全議題，常需要為服務對象伸張社會正義及保障相關權益，自然容易受到民代關注。民代的積極關注，可以彰顯其關心選民，也時常發生民代高舉著「選民服務」或「為民喉舌」的大旗，介入社工專業處遇，有時脫軌演出，只為搏得聲量的美名，實則增加社工的困擾（姚智仁，2021）。

一、各級民代涉入社福案件的異同

依照《公務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條規定，民意代表分為鄉鎮市民代表、縣市議員及立法委員，民意代表為是由人民選出，於議會等各種立法機關，來代表人民

行使政治權利的公職人員，任期為四年一期，連選得連任。在代議制度中，人民藉由選舉選出民意代表，來行使間接民主的權利。

（一）鄉鎮市民代表

為縣市基層組織——鄉鎮市的監督代表，關懷鄉鎮市的各種建設發展，對於社福事件的介入會以人民的請託為主，惟影響的範圍只能到鄉鎮市行政部門，有些涉及縣市委任事項，鄉鎮市的公務員無裁量權，鄉鎮市民代表也難以干預。為了能干預更多事項，有許多鄉鎮市民代表會與轄內的議員、立法委員共同設立聯合服務處，使得干預力道加重。

（二）縣市議員

為縣市的監督代表，為本文最常出現介入的人群，議員關懷縣市各種建設發展與人民的福祉，對於社福事件會以個案事件介入，並透過介入個案的過程中，期待於該縣市建立制度及一致性的流程。如同鄉鎮市民代表一樣，會與立法委員合作，成為聯合服務辦公處，以整合選民的需求，達成選民服務。

（三）立法委員

為民意代表最高職務，主掌各種福國立民的法案，於盤點鄉鎮市民代表與縣市議員於服務案件中，分析為中央立法的層

次才可解決，就會透過立法委員於中央立法層次訂法或修法，建立全國通用一致性的程序及制度。這也為何許多立法委員會與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合作，成立聯合服務處來服務選民。

二、易接受到民代關說的案件型態（陳逸淳，2016）

（一）社福補助案件

社會行政人員主要的業務在於審核各類補助金的發放，包括老人、身障、低收入、兒少等等，收入、動產、不動產資料都要逐項審查，一旦當事人的經濟狀況改善，而失去了領取補助的資格，許多失去補助資格者找來民代施壓要求持續發放補助。第一線社政人員面對這些人，既無權逾越法定標準決定發放與否，卻又必須直接面對各式各樣的言語恐嚇與民代的直接施壓。他們夾在法令標準與民代壓力之間，成為對峙的直接承受者，經常裡外不是人，所面對的壓力之大與所需要的耐心之高可想而知。例如，民代為了要給陳情者（特別是有相當權勢的陳情者）一個交代，往往會極盡所能迫使社工妥協，一方面可以藉此表現出自己認真於「選民服務」，另一方面，身為民代也有所謂的「面子問題」，因此經常強力施壓要求社工屈服，否則便覺得自己面子掛不住、民代的威嚴掃地。民代介入對社工緊急處遇的影響無所不在，然而礙於第一線社工有

責任而無實權，又缺乏相關法令規範，所以面對民代介入，第一線社工人員往往毫無招架之力。

（二）兒少保護案件

是類案件易受到民代關切，尤其是未滿18歲兒少，自我保護及自主性較為弱勢，可能需要各方資源協助，如又併有身心虐待，更易引起民代的關注，並介入社工的處遇。而當兒少保護通報事件（兒虐、亂倫、家暴、遺棄等）明確成案，相對人自知理虧時，反而更會透過民代介入來爭取主導權，例如惡意向民代控告社工態度不佳、怠慢、說謊等，希望藉此打擊社工來獲得在案件處遇上的退讓和妥協。儘管，當案件已明確成案時，民代的關說其實對處遇內容的影響有限，但是民代的介入仍然對第一線社工造成巨大的壓力和困擾。如中部某議員就曾介入社工處遇，並透過議會質詢時，指責社工「坐領高薪」、「只吃飯拉屎」，不關心16歲獨居的青少年，放任其從13歲就獨居，身邊沒有任何人陪伴（自由時報，2016）；南部某議員介入兒童保護案件評估處遇，利用選民服務開啟自媒體網路直播，揭露個案資料與社工主管手機號碼，並公開質疑安置過程合法性（邱灝唐，2019）；北部某議員接受角頭老大請託，介入兒保社工調查失蹤兒少一事，要求社工不要再介入調查（林金梅，2015）；更有地方民代接

受施虐者請託，干預社工保護安置評估，並認為施虐者管教兒少有其理由，社工不應該保護安置（羅鼎誠，2013）。在實務上更有民代利用媒體製造輿論壓力，企圖迫使兒保社工強制安置（Yu & Liao, 2020）。

（三）街友服務案件

北部某議員介入社工專業處遇，認定北市約聘社工為裁判兼球員，該社工曾擔任某協會理事長，利用遊民夜宿中心每月申請七萬多元的補助款，根本是「球員兼裁判」、「利用遊民撈錢」，還舉辦遊民生活體驗營，製造街友、製造社會沉淪的亂象，要求北市社會局檢討遊民夜宿計畫，解散遊民專責輔導小組（自由時報，2015）。

（四）性侵害案件

根據羅鼎程（2013）的研究，緊急安置和庇護案最常遭遇民代關說。例如，家暴事件的相對人常以片面或錯誤資訊告知民代，如「社工員濫權帶走孩子」、「孩子的傷是自己跌倒造成的」、「我沒有亂摸我女兒」，「是社工教我女兒那樣說的」……等等，來掩飾家暴或性侵害的行為，甚至捏造故事，讓民代在被誤導的情況下介入案件。臺南也曾發生過某議員利用議會質詢免責權，在教育局答詢球場興建進度問題時，突然揭露校園性侵案，

譴責校方知悉後卻未即時介入（洪瑞琴，2019），後同黨議員模仿問政，亦在議會質詢時間於指責社工未主動協助驗傷與協助連結經扶資源（林雪娟，2022）。

參、民代介入服務對社工的影響 （姚智仁，2021）

一、讓社工無所適從

如果民代持續的介入保護案件，都可改變其處遇結果，後續會讓人民誤以為「找民代施壓是有用的且是可以更改結果」的錯誤認知，往後的每一件人民只要覺得不如己意，都會找民代來施壓。主責社工除了覺得感到壓力之外，工作流程的SOP也形同虛設，社工會無所適從，這樣就形成「因人設事」，倘每個人都找民代施壓，請問行政權如何行使？專業行政的裁量權因此無所適從，形成立法權處處干預行政權，此舉會動搖整個憲法的三權分立的制度。

二、讓社工陷入高度違法風險性

民代介入社工專業而向高層長官施壓，長官則命令基層社工配合民代訴求更改審核決定或處遇作為，倘其更改決策而被舉發違法，民代可否承擔其後果？社工違法後續將面臨懲處及懲戒，甚至影響其職業生涯升遷規劃。許多民代干預行政作為而事後遭到司法調查時，常回應說：

「基於選民服務了解狀況，行政做為是否調整，由業務端決定，民代只是建議……等」，顯然民代介入社工專業而有違法事由，仍可安然脫身，留下的只是背黑鍋傷痕累累的社工。

三、讓社工受壓迫對專業失望

民代的施壓途徑，一邊對高層長官，另一邊又找媒體記者來報導，致使高層長官易受到媒體報導而對社工的處遇有所懷疑，實務上民代介入易影響到長官對基層社工的信任度，倘長官沒有承擔的責任及勇氣，社工除了面對外敵民代，還得面對內患長官的施壓，社工面對雙重壓力更難以執行其專業工作。上述實務現況與研究不謀而合，何彩燕與黃源協（2005）指出公部門社工在處理案件時，易受到長官和民代壓力及關切等等；倘此時民代又聯合媒體，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政治力又會再加壓，擴及到全國不只是地方縣市首長，甚至連中央長官或監察機關都會高度介入，使得兒少保社工的行政工作又會增多，除了要寫專案報告及時間序列之服務脈絡給地方首長知道案情狀況，面臨受長官的多方質疑及指責，又得面對監察機關的公文時效施壓；另媒體所造成的輿論壓力，鍵盤酸民的攻擊，又使兒少保社工有許多負面的想法。如黃彥宜（2009）指出，在這個充滿敵意的工作氛圍，讓兒少保社工面對都是究責文化，主管、政客、

媒體等著兒少保社工犯錯時大加撻伐，使得兒少保社工身心狀況受到影響，甚至讓其產生歸去來兮的想法，而不願再投入保護性工作。也有研究顯示，社工人員發現主管未能支持社工員的決定，在面對民代的責難下，要求社工符合民代的期望及更改處遇決定，會讓社工充滿挫折，也對專業產生失望（Yu & Liao, 2020）。

四、社工容易有職場創傷而離開

社工處遇及審核如果因民代的介入而更改決策，後續涉及違法處遇，甚至因此而發生死亡案件，長官指責、媒體報導、民眾攻擊撻伐，甚至又得面臨懲處、甚至懲戒的流程，社工身、心、靈備感挫敗及失落，致使社工易產生負向情緒及自我責備，使得社工就易帶著創傷甚至專業枯竭（Burnout）而黯然離去，倘社工自我能量不足，無法處理創傷，甚至未來不再從事社工的工作。

有研究顯示，民代介入案件時，常以為民服務為由，企圖影響社工個案處遇，對此造成社工相當大的壓力（汪淑媛，2013；游美貴，2013；黃彥宜，2009）。所以，民代的過度的關心與介入，對基層社工最大的影響是增加心理壓力，易使兒少保社工容易難以施展專業處遇，如又遇到長官遇到民代都順從的執政風氣，就會使得社工備感壓力，因此民代過度介入也成為「兒少保社工難以久任」最重要因素

之一。有研究顯示，社工師會轉任離開社工界，在組織層面因素影響為工作內容及環境不友善及組織對專業自主性的專業尊重程度有關（何彩燕、黃源協，2005）。民代影響高層長官，高層介入專業處遇進度影響職場工作氛圍不佳，對專業自主性也不尊重，嚴重時影響兒保社工流失；或者基層同仁對於組織沒有向心力，對於在組織工作無榮譽感。

肆、因應民代介入社工專業的 措施~以兒少保案件為例

當兒少保社工遇到民代介入，如何翻轉這種關說文化？又民代關說是一種民主國家特有文化，可否建立一套公開透明機制讓民代可以執行其選民服務？又要如何才能讓民眾看見民代及社工都有盡其責為民協助？讓民眾理解許多決策是因為「制度及法規」，而且讓民眾學習到許多事情不能「因人設事」。作者身為社工督導兼兒保組長總是思考如何讓立法與行政共好，並創造雙贏，在不違背專業職責、價值及立場的前提下，除了開始理解政治文化，也開始思索從兩端取得工作平衡，以下是我從實務工作現場的反思，對於民代介入時因應措施。

一、主動與民代對話並掌握案件，降低干預的程度

社工督導應得到長官授權而與民代端對話，解決民代的疑問，民代會來關切，其得到資訊是一方的詮釋，無法了解另一端的面貌，社工督導主動與民代對話，說明處理程序、流程及相關法律規定，並釐清民代所了解的資訊，一方面協助民代對於案件的釐清及案家的訴求，一方面也順勢讓案家知道我們盡力協助並依照現在制度及流程處理。

二、與民代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及對話機制

社工督導平時應與民代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以利於發生案件時可理性對話。政府局處雖設有議會聯絡人，但因應不同層級的民代，建議或許可以設置所謂「民代回應人」，對於民代回應人也可徵用過往有從事民代助理經驗的人來擔任。考量民代有不同的政黨屬性，在充足預算下，如可多聘民代回應人來經營，更有助於組織與民代互動關係。故組織需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態，把民代納為「網絡」並積極經營，倘有遇到民代關心案，就可透過民代回應人與民代端對話，減少對社工的衝擊。

另外，Yu與Liao（2020）對於民代介入提出，包括建構倡議民代對於保護性業務的理解，可公開邀請民代的辦公室助理

參與保護性業務說明會；民代介入議題關切的公開制度；建構民代介入的標準因應流程等。故於與民代互動過程中，可以主動提供紙本並說明保護工作的流程，制度設定的背後思維，讓民代成為組織的助力，透過民代去教育案家，反而有助於社工處遇。

三、特殊案件主動向長官報備，增加長官對社工的信任度

對可能容易成為政治攻防的特殊案件，社工督導應主動向直屬長官報告與說明，讓長官有預期準備會面對民代，避免長官被民代突襲詢問而不知所措，而引發社工處遇的負向情緒。尤其是兒少保護安置案件，若評估家長可能會請託民代，可在評估要進行保護安置處遇時，要讓長官知悉，以及提前擬定因應之策。此舉也可讓長官在民代介入時，有更合適的應對和說詞，以及同時展現對基層社工處遇的支持。

有研究指出，臺灣民代高度介入兒保都是對個案服務的處遇，包括安置庇護、會面交往或其他處遇；倘這些民代的介入時，如有督導或主管主動回應並正向支持社工，亦勇於面對民代的責難，會讓第一線的社工能無後顧之憂的服務個案，並提升專業認同（Yu & Liao, 2020）。另一研究指出，家暴防治業務應以專業評估基礎進行專業處遇，並以法律為後盾，

擺脫民代介入的壓力，充分尊重社工的專業判斷與處遇，如此方能維護社會正義，惟地方民代介入下，要達成此目標，仍需縣市政府高層首長全力維護與背書，否則光靠社工專業堅持恐難以抵擋（鄭瑞隆，2004）。

四、提升社工督導及兒保社工的政治敏感度

在社工專業養成教育裡，要探討社會工作與政治的議題，一方面提升政治與社會工作知能，一方面也提升實務工作時的政治敏感度。因為社工是在解決社會問題，社會問題有時候是政治力攻防的議題，故社工於處理個案時，就要敏感到案家與民代關係強度，例如家訪時，有些案家客廳的裝飾都會擺一些民代贈送的禮物（匾額、結婚喜幛），會談時案家也透露與民代的關係，這些都可以做為評估的依據，以及檢視該案件可能有政治介入的可能性，並適時與長官報告和討論。

另對其他縣市的民代關切案，兒保社工督導可將上新聞案件的民代案件，整理成教材，透過他轄的經驗成為本轄在職訓練，並提醒社工要留意的面向，也可以有即時學習的素材，防範類似事件的發生。另有研究顯示，納入政治生態理解於社工養成教育，可提升社工政治敏感度，面對民代介入時就較能因應及身心調適（Yu & Liao, 2020）。

五、主動參與各種倡議團體或活動

對於制度的再建構，也可尋求加入社工專業團體或社福團體集體倡議，以團體、協會、基金會及NGO團體的名義倡議，藉此與民代對話。透過對話，降低政治介入社工專業的影響力；甚至鼓勵進一步推派代表和支持具社工社福背景的候選人，積極參與制定社福政策，可以提高政治敏感度；增加社會資源與機會，來協助社工所服務的對象，進一步實踐社會公平正義（Abo El Nasr, 1991）。

六、借力使力為共存共生共好

在借力使力及問題解決模式的工作策略下，把一級工作的兒虐防治宣導，可藉由民代與媒體協助宣導，甚至未來也可邀請民代代言兒少保護宣導。為了使社工不會因為與這些社區的政治人物合作，而失去社會工作專業的主體性；有研究提醒社工仍需要聚焦於專業價值與倫理原則，以維護社會工作的功能（Pawar, 2014）。透過這樣化阻力為助力方式，可以讓把民代的在政治影響力降到最低，長期的策略也可以培力自己社工人從事民代參政，進而為兒少保護專業體制發聲，甚至立法建立制度，造福社工福祉，建構專業與政治是可以共存共生，甚至共好的氣氛及局面。

七、社工應持續反思行政處置要符合正當性

如遇到民代關說時，社工可先從法律層面檢視，再從相關細則、作業準則、規定、函釋及各縣市政府做法來比對，來增加自己的行政作為之正當性。當然，社工也應該時時反思自己，在執行公權力或處遇時，應保持社會工作的價值、專業及倫理規範，尤其是要展現自己富有同理心會談技巧及溫暖的特質。身處於華人社會上，總是被期待做人做事要必須通情達理與將心比心，事情就能圓滿（白倩如、曾華源，2021）。故讓弱勢者或案家可以感受到社工處事圓滿並積極努力的作為，就可降低民眾尋求民代或長官關說與施壓的可能。

八、身為社工督導在民代介入專業時可採取的措施

最後，是提醒身為社工督導在民代介入專業時，可以因應的三個措施。

（一）對於外在政治：要有政治敏感度來儘速調適

面對不同的長官及民代，所關注的政治面向及業務推動是不同的，長官的決策風向也易受民代施壓而有所不同，身為社工督導應該快速因應長官的風格及嗅出政治氛圍，故要多培力政治敏感度並以共好的價值，創造專業與政治兩造的雙贏。

（二）透過參與社工專業團體活動：提升社工專業能見度

可主動參政相關社工專業團體、社福團體及公會等組織，並協助兒保專業發聲及疏通，讓兒保社工專業度被看見。也可透過與民代互動過程中，去說明社工精神及專業，讓民代看見社工的專業，也可減少民代及政治力的高度介入兒保社工專業。

（三）從制度回應和建構~學習積極面對民代

對於民代介入，可研擬一套因應方式，如建構民代關說平臺之公開資訊，另外應該有民代回應人，回應民代介入案件，建構良好互動關係積極做為，避免再被民代渲染成政治事件而對社工專業有負向衝擊。

伍、結論

民主社會有民代監督政府，是再正常不過的制度，社工也應反思在案件的處置上是否有違反自己的專業價值、使命及立場。然而，有些民代會打著選民服務，不時拿出兒少保護案件來質詢；若又加上兒少有其脆弱性易成為社會大眾關注，時不時開記者會，讓兒少案件成為新聞事件，則很容易就升級成為一個政治事件（姚智仁，2023；Yu & Liao, 2020）。這樣更給

予選舉出身的民代，有更多以服務選民為名，行濫用社工資源之實的機會。甚至民代利用協助弱勢之景象，包裝製造政府協助弱勢不利情事，一般民眾常常可以從媒體中看到民代召開的記者會和公聽會，塑造其濟弱扶傾的形象，這些都會直接或間接打擊社工的專業形象和專業尊嚴；使得社工成為整體事件的代罪羔羊（游美貴，2024）。

在民主國家的制度，因有民代協助監督行政，並為民發聲與倡議，而改善和減少不合理的制度。理性而言，應該肯定民代的監督機制，只是民代監督不能無限上綱。民代利用言論免責權而消費社工的文化應該禁止，民代也應該去反思在專業問政下，應該面面俱到並平衡了解資訊，再來為民喉舌。而身為社工督導對於民代介入社工處遇，應保有高度敏感度及覺察，除了要將處遇的內容儘速回報長官，降低及減少民代關懷案件的發酵而升成政治事件，另外也要安撫社工並初步回應民代，建構良好的對話機制。

※本文感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游美貴教授指導。

（本文作者為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督導兼兒保組長）

關鍵詞：兒少保護、民意代表

📖 參考文獻

- 白倩如、曾華源（2021）。〈專業界線與華人社會關係之倫理議題〉。載於曾華源（主編），《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頁343-360）。洪葉。
- 自由時報（2015年6月8日）。〈應曉薇批「把遊民當搖錢樹」 芒草心前理事長怒提告〉。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342481>
- 自由時報（2016年5月24日）。〈罵社工像死人 段緯宇稱我要道什麼歉〉。<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07244>
- 何彩燕、黃源協（2005）。〈社會工作師職涯轉換之研究——以縣市政府具轉任資格之社工師為例〉。《臺灣社會工作學刊》，4，78-109。<https://doi.org/10.29814/TSW.200507.0003>
- 汪淑媛（2013）。〈影響家暴防治社工身心安全之風險因素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7（1），175-215。[https://doi.org/10.6785/SPSW.201306_17\(1\).0005](https://doi.org/10.6785/SPSW.201306_17(1).0005)
- 林金梅（2016年6月15日）。〈勿讓民代不當干預 危及社工捍衛弱勢權益！〉。自由評論網。<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349166>
- 林雪娟（2022年9月26日）。〈林燕祝批性侵案處理 社局：啟動調查〉。臺南報導。<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665694>
- 邱灝唐（2019年1月24日）。〈南市議員稱「有個團體叫NGO」 網諷：還有個組織Government〉。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682095>
- 非彌（2019年2月1日）。〈發生兒虐案就怪社工的歪風，只會讓人力更加短缺〉。TNL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3086>
- 姚智仁（2021）。《選擇和決定：堅持走在兒童少年保護工作之路的自我敘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a498cw>
- 姚智仁（2023）。〈兒童少年保護〉。載於游美貴（主編），《保護性社會工作實務專書》（頁113-140）。洪葉。
- 洪瑞琴（2019年3月26日）。〈南市議員爆：國小狼師長期性侵女童〉。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738960>
- 陳逸淳（2016年6月7日）。〈從應曉薇到段緯宇，社福前線的民代障礙〉。鳴人堂。<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9903/1747203>
- 游美貴（2013）。《保護性業務社工人身安全研究》。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 游美貴（2024）。〈兒少保護與福利服務〉。載於曾華源（主編），《社會工作概論——社會變革的推手》（頁196-222）。洪葉。
- 黃彥宜（2009）。〈保護性業務一線社會工作者職場暴力之初探：權力的觀點〉。《台灣社會

工作學刊》，6，80-118。https://doi.org/10.29814/TSW.200901.0003

鄭瑞隆（2004）。〈家庭暴力社工員專業服務困境與改進措施之研究〉。《犯罪學期刊》，7（2），129-163。https://doi.org/10.29607/ZHWHGX.200412.0004

羅鼎程（2013）。〈當華人的關說文化遇到社會工作——以保護性社工緊急處遇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44，359-373。

Abo El Nasr, M. M. (1991).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local politics in Egypt.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34(1), 7-25. https://doi.org/10.1177/002087289103400102

Pawar, M. (2014).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local commun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mperatives for political engagement. *SAGE Open*, 4(2). https://doi.org/10.1177/2158244014538640

Yu, M.-K., & Liao, M.-Y. (2020). Taiwanese protective social workers meeting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Perspectives of protective social workers.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46(4), 571-585. https://doi.org/10.1080/01488376.2019.1612818